

盼中國民主生根， 走出歷史循環

張澤

近年來，我有時聽到這樣一句話，二十一世紀是咱們中國人的世界。乍聽之下，覺得很過癮。繼而思之，不寒而慄！因為我在這句話裏依稀聽到阿Q的聲音：二十世紀咱們中國人活得不夠體面，沒有關係，反正二十一世紀會是咱們的。中國人倘若繼續維持這種心態，我看二十一世紀是不會比二十世紀好到那裏去！

今天矚目二十一世紀，我們的心情大有別於上個世紀末葉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中國環境的險惡，比現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步步進逼，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同時內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也日益加深，清帝國搖搖欲墜。可是在這樣危機重重之下，當時的知識分子卻對二十世紀的來臨抱有無限的樂觀。最能表現這份樂觀精神的是梁啟超。他在二十世紀揭幕時，正因為國內的維新運動失敗而流亡日本。就他個人的生命而言，這是一段非常黯淡的時期，可是他卻寫下《志未酬》一詩：「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我之希望亦靡有止期……吁嗟乎男兒志今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這首詩豪情萬丈，對未來充滿了樂觀精神。試問今日我們經歷了二十世紀重重的災難和鉅變，誰還能對歷史的進步抱持像他那種無限的信心和期待？

因此，瞻望二十一世紀，我不敢作過分之想，我只有一个起碼的希望：那就是在下一世紀，民主在



海峽兩岸的中國都能生根滋長。就台灣而言，這似乎是可以預卜的結果。不錯，今天民主化在台灣不但已經開始，而且有相當的成果，但是誰能保證民主化不會逆轉？近代歷史上一個國家搖擺於民主與權威政體之間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我們今天尚不能保證這種情形絕對不會在台灣發生。至於大陸，民主化的各種條件，都很欠缺，如何過渡到一個民主的社會，毫無疑問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但願這過程能在二十一世紀逐步實現。這自然只是一個期望而已。

我把期望集中在民主，並不代表我對民主實現以後的社會有何奢望。我知道，民主的實現並不意謂中國從此可以安享富強康樂。首先，就經濟繁榮而言，雖然從歷史看民主往往是在一個富足的社會裏出現，但是民主並不能保證經濟繁榮。今天的菲律賓、印度與墨西哥在政治上相當民主，但經濟仍然很落後。至於民主對文化的影響，也不一定完全是正面的。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文化往往傾向大眾趣味，因此很容易造成庸俗化的趨勢。同時，民主化勢必產生「群眾」社會，在其中的個人常常受時髦和習俗牽引，結果是「群性」伸張，「個性」萎縮。這些趨勢難免束縛文化的創造力，降低文化的品質。此外，多元的民主社會勢必承認多元的利益集團結黨牟利，以金錢為手段，操縱政府，影響政策，流弊所及，往往造成金圓政治、污染道德風氣，侵蝕道德基礎。由此看來，一般人認為民主助長社會開放、文化繁榮，那未免太天真了。

甚至看民主對於政治的影響，以中國這樣一個廣袤大國而言，那也不一定是穩定作用。因為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難免有由區域隔閡和少數民族的認同觀念而造成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往往容易政治化、極端化，從而產生分離意識，製造整合危機。

基於這些限制，民主誠然不是一個完善的制度，但它至少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民主可以防堵權力的泛濫。就中國的政治而言，這個優點的意義尤其重大。因為在中國由權力泛濫所造成的苦痛和災難，較之任何其他天災人禍為大。姑就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悲劇循環而言，權力泛濫就是一個基本原因。不論是傳統的朝代動亂循環，或者是近代的革命動亂循環，歸根結柢，都與權力泛濫有極深的關係。只有民主，通過權力分置的安排與人權的保障，才能消解權力泛濫之災，而中國政治要想走上軌道，也只有以此為起點。

總之，翹首二十一世紀，我既無中國近代早期知識分子那份對歷史演進的樂觀和信心，尤恨阿Q心態所產生的自欺欺人之談，只希望下一世紀我們能由民主制度的生根滋長，慢慢走出歷史上的悲劇循環。除此之外我不敢有任何奢望與幻想。

張 灝 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